

天津与胜芳的戏曲渊源

甄光俊

五十年前我由于工作的缘故，曾经三次到访胜芳。第一次是在1959年，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胜芳归天津专署领导，天津河北梆子剧院附属学校招生，我参加招生小组，到胜芳挑选学生。第二次是在1960年，我随河北省戏曲研究室和天津市戏曲研究室联合组成的河北梆子剧种调查小组，到胜芳了解河北梆子在当地的历史沿革。访问过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口述的内容，多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他们的描述，使我了解到昆曲、梆子、京剧、评戏在胜芳沿革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三次是在1962年，天津河北梆子剧院韩俊卿副院长带领小百花剧团在胜芳人民剧场演出，当地有一个评剧团，利用小百花剧团演出之余，跟胡秀萍、李秀雯（电影明星李秀明的姐姐，工小生）对口学习《花园赠珠》，我在旁边拉板胡伴奏。

三次来到胜芳，胜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历史上戏曲活动繁荣，梆子、京戏的一些名家大腕，当初在这里接受艺术熏陶和启蒙教育，从这里起步后经过在天津演出实践的锻炼与检验，在各地舞台上声名鹊起。这次来胜芳之前，我努力地回忆当年从胜芳了解到的情况，可惜我早年的十二本采访笔记，“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但是我们整理的四本油印本侥幸保留了下来，本子上印的一些材料得之于老艺人的口述，十分详尽，十分宝贵，许多内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北省艺术研究所编纂《中国戏

曲志·河北卷》的时候都用上了。因为当时是省市一起合作的，有些内容我现在还能回忆上来。这些琐碎记忆也能说明，天津与胜芳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历史渊源。今天我重新来到胜芳，看到胜芳欣欣向荣的城镇化建设，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与昔年印象中的胜芳不可同日而语，从内心生发出许多感慨。然而，不管社会外在环境如何变迁，历史上胜芳与天津的人文往来和文化联系，无论如何是不能淡化的。回顾天津与胜芳的文化传统，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都是京津冀地域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

天津不仅与胜芳，扩而大之到霸州市、廊坊市乃至河北省，从历史到现在，许多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仅就个人所知，从戏曲方面说一说这种历史渊源。

咱们的京剧艺术至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李春来、俞菊笙、黄月山等武生行当三大流派，继其后者如杨小楼、俞振庭、李吉瑞、李兰亭、尚和玉、盖叫天等武生名家，艺术所宗不外这三大流派。三大流派之一的“黄派”创始人黄月山就是胜芳人。他生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卒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他是梆子坐科，学演武生，半路改唱皮黄（即后来的京剧），兼工武生及武老生。因为黄月山年轻时体形较胖，人送雅号“黄胖”。查阅早年的

报纸或前人的笔记，往往不直呼黄月山学名，而昵称“黄胖”。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黄月山搭北京嵩祝班，崭露头角，又改搭宝胜和班，名声大噪。后来落户天津，轮流在各大名园担任主演。他所演诸如《巴骆和》《薛礼叹月》《风尘三侠》《莲花湖》《枪挑安殿宝》《宏碧缘》等剧目，在天津盛极一时。黄月山武功精湛，尤其擅长在歌唱时通过嗓音变化，塑造剧中人物苍凉、悲壮的人物形象。他扮演《薛礼叹月》里的薛礼，《巴骆和》里的骆宏勋，剧中的唱段在天津群众中流传甚广，很多戏迷都能仿唱。黄月山在演出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世人称之为“黄派”。他进入中年以后，主要是演武老生剧目。

“黄派”武生、武老生的艺术成就，在南北剧坛影响十分广泛。民国初建时在天津担任正乐育化会会长的著名演员李吉瑞，系黄月山嫡传弟子。黄月山作古后，李吉瑞继承乃师衣钵，将一出出“黄派”名剧赓续上演，使黄月山苦心孤诣创作出来的“黄派”艺术得以沿传下来。

此外，黄月山的传人还有马德成、瑞德宝、小达子（李桂春）等多位京剧、梆子名家，他们为“黄派”艺术的传承做出过突出贡献。“黄派”武生到现在已经传承了五代。黄月山对京剧的贡献是名彪青史的。黄月山出生在胜芳，辉煌期在天津。所以说，黄月山是胜芳镇的骄傲，也是天津的骄傲。

前边我谈到黄月山的传人里还有一位名家小达子，他是霸县新章村人。今天上午参观了李少春纪念馆和大剧院，李少春是小达子的哲嗣，纪念馆里有关于小达子父子的详细介绍，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霸县籍戏曲名家，还有岔河集村的董家：从董玉山、董志斌、董文华到董圆圆，已是四代梨园世家，他们都曾在天津大红大紫，并且落户天津。董圆圆从天津戏校毕业后到北京的中国戏曲学院深造，现在是国家京剧院的主要演员。

梆子、京剧初兴时期，戏台上没有女艺人，所有生、旦、净、丑角色，一概由男性扮演。光绪中期，天津的戏台上出现女演员，在第一代女演员的队列里有一位曹桂芬，她是胜芳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曹桂芬的妈妈曹二屏，唱戏出身，曹桂芬七岁时被她送到天津，拜很有名气的梆子男演员夜

来香（艺名）为师，学演花旦。没学三两年便在天津的下天仙茶园登台，给师父配演娃娃生。曹二屏性格乖张，而且嗜毒，她以鞭抽棍打方式逼迫女儿加紧习武练唱，以期早日成才。曹桂芬历尽辛苦练就一身表演技能。她凭着优美的身段，卓越的艺术天赋，独立表演《鸿鸾禧》，一炮打响。每次登台，格外受观众欢迎。渐后，她相继上演“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三种行当合演的玩笑剧目），包括《小上坟》《小放牛》《小过年》《打樱桃》《打刀》《打灶王》《打杠子》《背凳子》之类，她在这八出戏里，所唱旋律既不属梆子腔也非皮黄腔，而是吹腔、柳枝腔、罗罗腔、鲜花调乃至民歌小调；伴奏乐器既没有京胡，也没有板胡，而是横笛、海笛（小锁呐）或大唢呐。无论哪种腔哪种调，从曹桂芬的嘴里唱出来又甜又糯，十分动听，身段表演滑稽、逗趣却不低俗，唱念做舞俱都讨人喜欢。一些捧角的戏迷称曹桂芬所演八出“三小戏”为“曹八出”，继曹桂芬之后京剧舞台上许多女演员经常上演这八出戏，业内人士称之为“小八出”，显然是从曹桂芬的“曹八出”演变出来的。

曹桂芬迅疾成为天津茶园里的红角。那时，社会各界人士把女孩子唱戏当成一件新奇事，争相走进茶园里观看。杨柳青画店的画师时常到茶园里观摩曹桂芬表演的“曹八出”，还把“曹八出”里的《小放牛》《小上坟》印在杨柳青年画上。由于年画的广泛宣传，外乡人到天津做买卖、串亲戚，总忘不了进入茶园看曹桂芬表演“曹八出”。

“皮黄”艺人看到女孩子登台唱梆子特别能争取



胜芳古戏楼

观众，也踩着梆子戏班闯出的路子，教女孩子学唱“皮黄”腔，并且把在梆子戏班唱红的一些女角，吸纳到“皮黄”戏班，梆子、“皮黄”同台合演，行话称之为“两下锅”，曹桂芬加入了“皮黄”戏班，并且很快又成为“皮黄”女演员里的佼佼者，不光红遍天津、河北，南下上海、南京演出也非常走红。曹桂芬的母亲为了让女儿多给家里挣钱，在曹桂芬到了该婚嫁的年龄也不准许她嫁人，曹桂芬终日苦闷，无心作艺。有一天趁人不注意，找了个机会跟着曹锟手下的一个侍卫私奔了，从此下落不明。1960年我在胜芳搞河北梆子普查的时候，一些胜芳老乡还记得曹桂芬的家族情况，我们记录下他们的口述，并收入河北梆子史料征集组编印的《河北梆子史料集》里。

据戏曲艺人回忆，像黄月山、曹桂芬这样从小在胜芳接受戏曲的影响，后来成为戏曲专业艺人者还有一些。但那个年代社会民众把戏曲艺术看作是贱业，即便唱红了也很少有人会在史籍上留名，民间对他们的传说也只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见诸文字记载。

1960年，南开大学戏曲小说教研室主任华粹深教授牵头，联合河北省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局，抽调省戏曲研究室马龙文、毛达志，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张明超和我，南开大学鲁德才等老师一起参加，对河北梆子剧种史开展普查，其间曾将采访河北梆子老艺人的笔记分四册油印出来，当时正处在全国、全民度荒年代，油印本所用的那种纸张质量极次，但上面的内容全都来自老艺人口述亲历亲见的人和事，相当宝贵。那时留在我印象中的胜芳是个“戏窝子”，昆曲、高阳腔、弋阳腔、哈哈腔、梆子腔在这里都曾兴盛一时，后来又流行评剧。当年我们在考察的时候，访问过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得有一百三四十岁了，当时他们口述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比如他们描述的胜芳镇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阁，故事的来龙去脉非常详细。我们整理的油印本里虽然保留了一部分，但不是原始记录，是按照当时的政审标准加工、整理出来的，这个油印本现在完好的保留在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天津南开大学资料库也有，我手里还只有两本。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它记录了河北梆子在京津冀（当然包括胜芳在内）沿革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那时候因为搞的是河北梆子调查，黄月山是学河北梆子出身，曹桂芬也是河北梆子出身，他们都是后来改工京剧。当年在胜芳除了河北梆子，还流行哈哈腔、昆曲等等。北方昆曲的一代宗师郝振基，在胜芳活动很多，还培养了几家昆曲班，我们听当地老乡说了，也记录下来，但没有作深入挖掘，搜集到的资料，也没有编到河北梆子史料集里去。另外，胜芳的那座戏楼，就是九成楼，乾隆年间建立，咸丰年间修葺，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还在演戏，来自天津的很多演员在那里演出过。乾隆年间胜芳就有戏楼，这就说明胜芳的经济发达，人口一定比较稠密，不然的话不会有规模这么宏伟的戏楼。即然有戏楼，演出活动肯定少不了。当时的老人们跟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胜芳就出螃蟹（因为那时候招待我们天天吃螃蟹），我们胜芳可是直隶省六大古镇之一。”胜芳的历史文化真值得深入研究。

几十年前，天津有一位名叫复艳秋的河北梆子老艺人，1960年的时候她跟我说过——1932年她和小瑞芳搭伴儿到胜芳演出，很受这里的戏迷们欢迎，早年在冀中一带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儿：“三天不喝粥，攒钱去看复艳秋”，这句俏皮话就源出于胜芳群众之口。可见当地群众对河北梆子的热爱程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复艳秋和小瑞芳都是非常有名气的梆子女演员，如果胜芳的演出市场不繁荣，我想她们不会到这里来演出。还有，五十年前我在胜芳采访的时候，记得当地有个“铜器刘”，他做的响器非常精到，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戏曲团体都到胜芳来订做“铜器刘”的大锣、铙钹、九音锣等响器。

回忆这些琐事，是想印证天津与胜芳在戏剧方面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今天和胜芳的朋友们一起作学术交流，我获益良多。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胜芳镇这些年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特别注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经济建设和城镇格局跟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传统文化项目也保留下来很多。天津艺术史学会、胜芳古镇管委会组织的这次交流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今天仅仅是个开头，还有许多线索有待于我们两地的同仁携起手来深入开掘。祝愿京津冀的艺术史研究取得新成就。